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4.015

“两个大局”与新时代理论创新

张鉴洲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两个大局”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国际国内形势演变作出的重要研判,构成了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历史基点。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新时代理论创新将“两个大局”作为重要战略思维贯穿始终,牢牢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确保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洞察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应对“两个大局”相互作用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为破解重大时代课题提供科学指引,为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

关键词:“两个大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4-0121-07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①“两个大局”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重要研判,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与人类社会所处的现实境遇与历史方位。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两个大局”的交织激荡正改变着中国面貌与世界格局。面对新的历史形势,中国共产党应当怎样认识“两个大局”之于新时代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如何在统筹“两个大局”的过程中推进新时代理论创新,并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破解“两个大局”相互作用带来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实现从识局、入局再到破局的创新发展,成为当前学界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

一 识局:“两个大局”交织激荡构成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历史基点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

内容。”^②“两个大局”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历史背景最为简明的概括,也是党推进新时代理论创新的时代幕布与逻辑起点,因此,充分理解“两个大局”是我们分析研究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前提。事实上,不论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二者都是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协同演进的结果,都应当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域中加以审视。具体而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变之局是大航海时代以降由欧美国家支配的世界格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更易之局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衰败凋零的历史危局,故而探寻“两个大局”的特征与实质,又必然要从历史逻辑出发,明晰“两个大局”的内在生成理路,继而厘清党的创新理论与国际国内形势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

从近代世界格局来看,它的奠定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相关。自十六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日臻兴盛促使西欧诸国不断向外殖民扩张,在武力征服与经济侵略的双重威慑下,原本相对孤立的亚非拉诸国“都卷到文明中来”,并且“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③,由此逐步构筑起资本主

收稿日期:2024-05-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05)

作者简介:张鉴洲(1999—),男,福建浦城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义世界体系的基石,整个世界格局也在这一体系的支配下发生巨大改变,它不仅“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①,强化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而且让各国之间的联系交往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当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又能将其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正式转化为有系统的征伐、兼并和统治”^③,致使“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④,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格局的残酷性、掠夺性与不平衡性。

近代中国的历史危局又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的产物。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曾多次达到文明高峰,但漫长的封建时代也埋下了衰落的因子,马克思曾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殖民战争成为激活这些衰落因子的催化剂。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迎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法继续支撑国家运转,中国也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沦为边缘国家,成为欧美列强肆意宰制的附庸,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衰世。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曾主动向西方文明求索,尝试以资产阶级学说改造中国,但最终收效甚微,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直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知识分子从社会主义道路中看到了变革中国与改变世界的希望,李大钊在1919年就曾盛赞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社会主义道路将挽救中华民族日益深重的危机、撕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裂口,给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⑥。在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下,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华民族危局与近代世界格局的激烈碰撞中诞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不仅肩负起挽救近代中国历史危局、打破旧世界格局的使命,而且逐步习得了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创新自身理论的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能够顺应时代变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一方面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指出中国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无法直接建立起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⑦,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当时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⑧,由此提出中国的前途是建立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⑨,进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面对美苏两强冷战、国际形势激荡的环境,毛泽东仍作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的判断^⑩,并且提出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国共产党开始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指出从“总的国际形势”来看,“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⑪,再加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也急需实现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由此,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揭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③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64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4页。

⑥《李大钊全集(第2卷)》(最新注释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⑪《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幕,书写了邓小平理论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而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面对世界两极格局瓦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遭遇严峻挑战,邓小平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依旧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前途仍然是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①,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创新,为 21 世纪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又作出全新判断。对国内情况,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经过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③。“三个前所未有”昭示着中华民族已经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被动挨打、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势不可挡。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历史进步也成为世界历史转轨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国力的提振,世界力量格局发生巨大改变,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已成明日黄花,对此,习近平一方面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潮流,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变得越发紧密,但另一方面又指出“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④,伴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进一步增多,国际社会随时面临着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新形势酝酿新变局,新变局呼唤新理论,“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⑤。马克思主义是回应时代的理论,是引领时代的先声,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

共产党不能因循守旧,也无法独善其身,“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⑥。故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认识时代、分析时代、引领时代的思想武器。

二 入局:统筹“两个大局”是推进新时代理论创新的重要战略思维

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两个大局”交汇作为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历史基点,更将统筹“两个大局”作为重要战略思维贯穿于理论创新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概言之,“两个大局”交织激荡带来的绝非一时之变、一国之变、一事之变,而是长时段的社会变迁、世界性的历史巨变、全方位的系统变革,党的二十大提出“六个必须坚持”是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正是着眼于“两个大局”所蕴含的历史复杂性,只有自觉运用“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保证党的理论创新在时代浪潮的翻涌喧腾中仍可以沿着正确道路推进。

首先,“两个大局”交织激荡带来的是长时段的社会变迁,要求党在推进新时代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当前,世界格局在呈现“东升西降”趋势的同时仍以“西强东弱”为现状,民族复兴虽然行则将至但又道阻且长,由此可见,“两个大局”交汇带来的绝非短时间内的突变,而是较长历史时段中的渐变,既会有上一个历史时代遗留下的难题与困境,也会在开启下一个历史时代的过程中产生新问题,故而党的创新理论既要以守正之姿应对时势之常,又要以创新之力应对时势之变。

一方面是以守正之姿应对时势之常。从国际形势来看,当前世界体系仍构筑于资本主义原则之上,虽然“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②《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③《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64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7页。

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①,换言之,在彻底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破除其运行逻辑和固有矛盾前,人类都难以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②,人类社会还在逐步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时间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过渡,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分析仍具有现实意义和批判力度,“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③。我们在推进理论创新时仍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手术刀”,来剖析“两个大局”中未随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的经典问题、根本问题。就国内形势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④,习近平也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⑤这要求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不能超越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继承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另一方面是以创新之力应对时势之变。社会变迁必然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与新挑战,这要求党在推进理论创新时不可迷信本本,不能固守教条,“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⑥。党的创新理论要做到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在不丢“老祖宗”的基础上说新话、发新论。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社会实践、做好调查研究,通过对党情、国情、世情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为理论创新提供最为鲜活的实践素材,使实践调研的过程成为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的对立本身的

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⑦

其次,“两个大局”交织激荡带来的是世界性的历史巨变,要求党在推进新时代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与自信自立的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着眼于人类命运,但其出发点与落脚点仍是中国的前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不仅关乎中国命运,更同世界各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两个大局”攸关人类命运与中国命运,是二者的辩证统一,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使得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不能将视野局限于中国一隅,而应当以胸怀天下的气魄放眼世界,研究当今世界面对的共同问题,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更成为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集萃,增强党的创新理论对世界人民的理论感召力和价值凝聚力,在造福中国的同时惠及世界,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坚持胸怀天下绝不是照搬照抄外来文明,不是任何形式的“全盘西化”和毫无底线的“去民族化”。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为了抑制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正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思想文化渗透,因此,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也应当坚持自信自立,坚守中华文化的价值本位,在文化交流中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决抵御西方文化中的霸权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侵害,保持党的创新理论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当然,要真正做到理论层面的自信自立,不仅需要对外来文化葆有清醒认识,更重要的是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体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如若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能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③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④《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⑧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兴也将是没有根基的浮水之萍。习近平指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①因此，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基础上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巩固党的创新理论的文化主体性，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最后，“两个大局”交织激荡带来的是全方位的系统变革，要求党在推进新时代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纵观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局，无不是各种矛盾和问题复杂交织，无不是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变革，因此，面对“两个大局”交织激荡，党的创新理论应当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筛选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尤其是“两个大局”的加速演进强化了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因此党在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更应当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回应时代提出的现实难题，提高党的创新理论的说理力和战斗力。

此外，“两个大局”的相互作用使各个问题间的内在关联空前紧密，各种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显著强化，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党在推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自觉运用系统观念，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进行通盘考量，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立足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来谋划问题，紧密把握“两个大局”、“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且始终保持对中心任务与重点工作的清醒认知，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②

不过，不论“两个大局”如何演进互动，党的创新理论都应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价值准则，也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终极关怀，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根植于人民，也服务于人民。只有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理论创新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依靠人民的力量与智慧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党的创新理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

三 破局：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破解“两个大局”交汇带来的历史难题

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都是为了解决这一时代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特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重大时代课题提供科学指引，为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在科学认识、准确把握、正确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社会与人类社会不断前进。

（一）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重大时代课题提供科学指引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提出的三个重大时代课题。

其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主题，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改革开放书写了文章的上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接续书写文章的下篇，亦如习近平所言：“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④新时代以来，以习近

^①《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9日。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立了以“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为核心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①,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全方位的系统性解答,深化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其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矢志追求,但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时常陷入邯郸学步的历史窘境,长期在“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迷途中蹒跚前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正途,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再到党的十三大制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稳步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步走”战略,完整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概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本质要求作出了规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②。

其三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近一亿党员的大党,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③如其所言,大有大的优势,大也有大的难处,在过去一个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内部就曾出现过较为严重的腐化变质问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自我革

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使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二)为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

世界格局自近代以来曾发生多次内部调整,但就本质而言都是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正是要打破这种旧的世界秩序,使得“两个大局”交汇带来的不再是世界中心的简单转移,不再只是几个大国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是通过破解国际安全难题、世界发展难题、文明交流难题、生态保护难题,彻底改变原有世界格局中的霸权逻辑,建立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④。

其一是破解国际安全难题。安全问题始终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环顾当今世界,旧的殖民体系虽然早已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也不复存在,但是局部地缘政治冲突依旧持续不断,对世界和平构成极大威胁。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着眼于当前国际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为主线,着力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复杂命题,通过持续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在积极推进世界安全治理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此“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⑤。

其二是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衰退,面临着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三大系统性矛盾。对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

①《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②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3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3—434页。

⑤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2页。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实践成就为世界各国树立典范。另一方面又以不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了当前全球经济衰退问题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落后,而要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就必须使其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亦如习近平所言:“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①

其三是破解文明交流难题。“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但特定国家试图留在中心部分内的能力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②曾几何时,欧美文明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在近代以来始终掌握着文化霸权,但随着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兴起,欧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当中的支配地位遭到挑战,不同文明间的隔阂与冲突与日俱增。习近平强调:“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③对文明间的差异与碰撞,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观,充分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为破解文明交流难题提供了中国答案。

其四是破解生态保护难题。生态环境问题是关乎人类永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但伴随现代科技与工业的发展,全球生态文明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人类社会也在近几百年内频频出现生态危机。作为现代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曾经也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了自身国力的强大,但伴随经济形态转型升级,西方各国开始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态矛盾,在国际生态环境保护中未能承担起发达国家应尽的义务。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④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高度重视生态问题,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仅倡导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而且坚决反对西方环境中心主义以牺牲人类生存与发展权利为代价换取环境保护的极端主张,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阐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并行不悖的内在关联,由此实现对西方国家生态理论的“祛魅”,为全球环境治理指明了新路。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ZHANG Jianzho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wo overall situations” serve as an essential strategic analysis formulated by the CPC in response to evolv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marking a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ricate and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these two situations,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consistently incorporates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s a guiding strategic mindset. It firmly adheres to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encompassed in the “six principles that must be adhered to”, ensuring that the Party’s theoretical advancements progres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y anchoring itself in historical trends, it addresses the var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posed by “two overall situations”, providing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ackling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to the common challenges faced by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two overall situation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er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责任校对 徐宁)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1页。

②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8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4页。